

余英时

金 庸

袁伟时

江 平

张 灏

金耀基

陈方正

刘笑敢

梁其姿

孙康宜

张信刚

郑培凯

李
怀
宇

访问时代

十二位知识人的
思想世界

李
怀
宇

访问时代

十二位知识人的
思想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访问时代 / 李怀宇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99-4233-9

I. ①访… II. ①李… III. ①名人—访问记—世界—
现代 IV. ①K8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8957 号

书 名	访问时代
著 者	李怀宇
责 任 编 辑	王一冰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233-9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出道之时，满怀理想，相信正义，读前辈著作而心动，便义不容辞地访问知识人，一心为历史留下初稿。一晃多年，跋过山，涉过水，遭遇小风波，目睹怪现象，渐渐懂得世事的复杂与人心的变幻，不禁对这个时代充满困惑。

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代已然巨变。物质生活与科技产品何其丰富，民主和科学依然任重道远。我拜访的许多前辈，一生都在历史漩涡中击浪扬帆，而理想的彼岸若隐若现于烟雨之间。先人一点一滴的恩泽，汇入时空之海。而今忙碌的时代，海边还有多少拾贝的闲人？

我常感人生的荒谬，仿佛在访问知识人时才能找到超凡入圣的幻觉。现实生活里，琐碎、平庸、无奈似乎命中注定，只好从思想世界里寻找从容、淡定、超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在精神层面，我相信古今中外有相通之心。庄子的《逍遥游》与苏东坡的《赤壁赋》，莎士比亚的妙语与托尔斯泰的深思，依然穿越时空，扣动心弦。

访问生涯对我而言，是问道解惑的赏心乐事。受访者各有成就，问答所及历史、新闻、小说、法律、民主、科学、哲学、艺术等，话题或有交叉，思想时有碰撞。虽然无法涵盖整个时代的思想世界，但是其间饱含着对人间的深切关怀，至少可以擦去我心中的一些问号。

我读过许多访问记，琢磨过口述历史，在思想与技巧上老老实实

地下过苦功。然而，访问工作越久，我发现自己提问的技巧越少，渐渐从一个“访问者”变成一个“聆听者”。甚至在整理成稿时，我会将自己的话一删再删，只起到一点起承转合之功，希望让读者更直接地听到受访者的的心声。照我的经验，专业的提问固然重要，真诚地聆听也能引出谈兴。当然，彼此激荡出思想的火花，更是可遇不可求的。请恕我无思想家和演讲家的天分，只会认真地记录下受访者的话，尽聆听者和记录者的本分。

长久而言，我对历史充满乐观主义，但短期来看，我对现世常抱悲悯情怀。现世当中，往往是名与利威风凛凛，伪君子与真小人得意洋洋。而放诸历史长河，不朽速朽，喜剧悲剧，自有公道。如今身处浮世，反思乱世，向往盛世，但见时代的问题层出不穷，且泡两杯清茶，在闲谈中会心一笑。

目 录

余英时：恢复人的尊严	1
金庸：写小说是玩玩	21
袁伟时：启蒙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49
江平：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	87
张灏：只有法制才能控制权力怪兽	103
金耀基：大学是知识创建基地	115
陈方正：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散步	133
刘笑敢：从庄子研究到文明反思	169
梁其姿：历史研究要关注弱势人群	187
孙康宜：重写中国文学史	199
张信刚：文化素质是各种学科的灵魂 ...	217
郑培凯：艺术拓展人类的心灵想象	233

余英时：恢复人的尊严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 年生于天津。1950 年至 1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 年至 1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读书时代的一个秋夜，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闲逛，无意间走进了石景宜赠书室，在僻静的书架上找到一套从 1966 年到 1996 年的《明报月刊》。从此每日无事我便来翻这本杂志，无人争阅，我尽可悠然从创刊号一本本翻起，往往忘了时光的流逝。当时我正醉心于金庸的小说，偶然读到由金庸创办的《明报月刊》，竟如读武侠小说一样废寝忘食。对我而言，这套杂志是人生中的“文林秘笈”。

在《明报月刊》的作者中，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尤其使我心折。余先生在《涵养新知，商量旧学》一文中说：“我以为今日若想在文化方面有些贡献，有两个方面不能不注意：一是介绍和吸收西方的新东西，一是整理和融汇中国的旧东西，朱熹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大概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纲领。”我觉得他做学问便是如此。阅读印象里，《明报月刊》中《红楼梦》、陈寅恪之热，皆由余英时的思想火花碰撞而起，而从 1966 年起国史上的关键问题，常有余英时独到的见解。从此我格外留意余英时的著作，见一本买一本，如今细数书架上的藏书，余英时作品有四十余本，为我藏书中作者之首。

2005 年夏天，我发愿在华人世界访问文化前辈，一入迷便乐此不疲。起因也许是早年的阅读经验，每读到心仪的前辈文章，不禁心向往之，而从事采访工作，常常能如愿以偿聆听真人教益。有时感觉就像和时间在赛跑，当望见前辈渐行渐远的背影，更使我自觉义不容辞。我无意中发现，无论是香港还是内

地的老先生，在闲谈中提到海外学人，余英时是中心人物。年岁越长，我对时代的关怀越深，对人生的困惑越多，所闻所思的问题，往往在余英时的著作中找到启发。于是，我到美国普林斯顿访问余英时先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余英时先生家在美国普林斯顿郊外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有一片小竹林，格局与一般美国家庭不同。屋中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2007年，我在“小书斋”与余英时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别后，在电话里，我漫无边际地问道，余先生如春风般解惑。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安静地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余先生曾用这种情况来形容历史人物康德和胡适：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中有人向康德立异，也有人和他同调，但决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睬他的学说。今天，学术界也将这种评价用于余英时。

在余英时的历史世界里，总是以“人”为本。在他看来，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从2002年起，他极力避免一般常用的“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尽量恢复“人”的尊严。

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李怀宇：现在的“国学热”似乎温度越烧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

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李怀宇：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不是现代才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在那个地方？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之间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要看是什么病。

李怀宇：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经过许多演变，有叫“国粹”，也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

李怀宇: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很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李怀宇: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国学大师”,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也是精神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一个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钱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李怀宇：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情。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但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太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在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职业也要谨慎，如果做一个职业是杀人的，制造军火的，就希望世界越打仗越好，越打仗军火卖的价钱就越高。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你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李怀宇：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是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

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经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来越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受不受人家注意,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了,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了,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做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者是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原来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

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的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李怀宇：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因为过去“分子”用得太过可怕了。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所以我就不想再用“知识分子”。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就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外国人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说读书人一样。第一次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讲这个问题，是2002年正式提出来的。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原来我们用习惯了的，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从前“知识分子”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我是受陈原的影响，日本人也用知识人，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李怀宇: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到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很好的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可以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李怀宇: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就感激涕零,

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就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我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没有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我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有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从小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能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